

许翼心:香港文学研究的最早开拓者

□刘登翰

许翼心先生走了,一个对生活散淡的人,却又是一个对学术执著而严谨的人。他嗜烟,每次见面,总伴着不停的吞云吐雾;茶也是喝的,这是潮州人的标志;似乎并不善酒,却善思,也善言,对“讲话”充满热情。业内朋友都有这种经验:暨大有两位先生都善于“化仙”(闽南话:神侃,亦可称为“话仙”),两位先生一是闽南人,一是潮汕人,都属闽南方言语系)。上世纪80年代开学术会议,最精彩的节目是晚上互相串门,然后聚在某个房间,七八个、十来个,椅子、床铺都挤满了人,以两位先生为核心,从学术到非学术,开始神聊。潘亚暾先生常在上半夜,许翼心先生喜在下半夜。有一次在潘亚暾先生房间聊得正起劲,有人看了一下表,说:“十一点,老许该来了。”话音未落,敲门声响起,果然是许翼心先生来了。

我个人还有一次特别的经验,1982年第一届香港台湾文学研讨会在暨大举行,我尚未入门,只是作为发起单位的代表前往参会。一天晚上,许翼心来我房间聊天,直聊到午夜两点。他谈起香港文学,如数家珍,所提及的作家、作品,大多我连名字都没听过。那种迥异于内地文学的特殊进程和形态,带给我极大的兴趣。我一直把这次夜谈,当作是我后来从事台港澳文学研究的最初的启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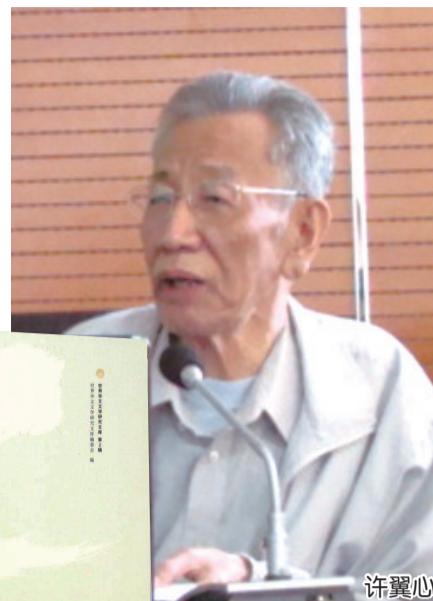
在大陆学者中,许翼心是香港文学研究的最早开拓者。就在暨大的那次会议,他给我看过一份他在暨大开设“台湾香港文学研究”课程的香港文学部分授课提纲,长达万字,章节分明,完全像是一部即将撰写的文学史大纲,他的计划也是写一部香港文学简史。两年以后,在厦门举行第二届台湾香港文学研讨会,他将这份提纲改写成一篇论文《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在会上宣读,无疑也是这届会议的重头戏。从授课大纲到论文,此时他对香港文学历史进程已有整体认识,对其中一些复杂的问题,都有深入的思考,对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家、作品,都有简约而精到的分析。今天重读这篇论文,不能不钦佩他在30多年前对香港文学就有如此深切的了解。改写后的论文分为7个章节,仍保持一种史的叙述状态:

一、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二、近代香港文学的开拓;
三、新民主革命时期的香港新文学传统;
四、壁垒分明的五十年代文坛;
五、现实主义文学在曲折中成长;
六、现代主义文学的流传与影响;
七、香港文学的转型换代与发展趋势。仅从这些章节的题目,就不知道此

时许翼心对香港文学的了解深度。他的“香港文学研究”课程是1981年在暨大开设的,此时大陆学者对香港文学的研究才刚起步,受限于资料的缺乏,许多学者只能就自己所能得到的资料,写点瞎子摸象式的介绍性文章。不能说这份提纲就很完整,例如对于被称为“通俗文学”的武侠、言情、科幻和历史小说,或许由于某些客观原因未予介绍和评论。但就总体而言,许翼心已站在当时香港文学研究的最前列。

后来我每次见到许翼心,都要关切地问起这部文学史写得如何了。他总是讪讪地说:还有些问题尚未弄清楚,还在准备。我以为这是他散淡人生的托辞,直到这次重读他为花城版自选集《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所写的自序《我与香港文学的学术因缘》,才知道他的严谨与慎重。他记住香港著名学者小思(卢玮銮)“短期内不宜编写香港文学史”的叮嘱。较之我辈匆忙进入文学史撰写,他提出的“纵横考察缓修史”的谨慎,或许是对的,但他为他未能最后完成这份夙愿留下一点遗憾和惋惜。

也是从这篇《我与香港文学研究的学术因缘》中,才知道他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香港文学研究的前沿并非偶然。中学时代,他在近邻香港的家乡汕尾,就有机会接触到香港报纸的文艺副刊,如《华商报》的“热风”“茶亭”、《大公报》的“大公园”,《文汇报》的“文艺”、《星岛日报》的“星座”,阅读那上面茅盾、夏衍、钟敬文、秦牧等的诗文,以及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黄谷柳的《虾球传》、江萍的《马骝精》等连载小说。及至1959年他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在广东省文化局的戏曲研究室,临时安排在新闻出版处的图书室住宿,又有机会翻阅图书室里当时香港出版的报刊杂志,除《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之外,还有《文艺世纪》《乡土》等,又可从书库里借阅50年代从旧书店和租书摊收缴来的大批旧书和港版图书,既有武侠,也有言情;既有左派作家夏易的《香港小姐日记》、洛风(唐人)的《某公馆散记》,也有右派作家赵滋藩的《半下流社会》。特别“文革”期间,他与文化界的一群“黑线人物”一齐被押送到英德茶山劳改场,让他有机会亲近了被称为“粤港派”的作家,如陈残云、黄谷柳、郑江萍、李门、周钢鸣、黄庆云、紫风(秦牧夫人)等,在同吃、同住、



许翼心

同劳动和同挨斗中,于有意无意的言谈间,熟悉了战前、战后香港文坛的一些情况。比起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进入香港文学的研究者,他提前了十几二十年就在观察和感受香港文学了。

放缓了香港文学史的撰写,并不等于放弃对香港文学的研究。进入90年代以后,他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从理论上关注香港文学整体发展的历史独特性。这是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治位置、文化位置、都市发展和介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地理空间,形成了香港文学的特殊地位和性质,加深对香港文学过程性发展的认识和结构性分析的深入。特别是1991年,他应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邀请,参与杨奇主编的《香港概论》的编辑,负责文化艺术部分。在香港三个月的考察中,完成了五万言的《当代香港文学艺术的综合考察》,分文学和艺术上下两编,其中的文学编对香港文学的历史发展、多元格局、作家构成、文学社团、文学刊物、文学活动和文学奖项等,以理论的视野深入到现状的评述之中。其对于文学形态的分析,以社会写实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大众文学三大类型,概括香港文坛繁复多态的文学存在,既有类型的归纳,也有代表作家作品的点评,阐述香港社会都市化发展带来的都市文学形态、性质和特色。对于曾经被忽略或贬低的现代主义文学和武侠、言情、科幻乃至“框框”杂文的所谓“通俗文学”,都从社会发展的都市化需要和现代性表征,由大众审美接受的角度,予以积极评价。这份考察报告以其

丰富翔实的资料和条理清晰的论析,实际上已具一部香港文学简史的雏形。

其二是重视早期香港文学发生的资料发掘。在当时的香港文学研究界,关注的多在当下,对于百年前乃至半世纪之前香港文学的状况,由于资料难以获得,大多含糊其辞、数据带过。许翼心却逆袭而行,他后期的香港文学研究,几乎都集中在近现代部分。他关注早期中文报刊与近代香港文学的开拓,关注辛亥革命与香港的文学革命,揭秘被誉为“近代报业怪杰”的郑贵公以开启民智为目的的文化行踪,评述被称为“近代革命派小说大家”的黄世仲毕生的文化活动和文学著述,论析被视为“香港新文学运动历史见证人”的百岁老人李育中的创作和评论,追溯从“海陆丰起义”出发的革命作家丘东平、陈灵谷……他爬梳史料,走访知情者,做了大量口述历史的实录。曾多次赴京和去港,拜访曾经参与香港文学建设的前辈,如在京的胡绳、夏衍、林默涵、黄药眠、钟敬文、林林、聂绀弩等,在广州的杜埃、秦牧、陈残云、芦荻、李育中、楼栖、李门、杨越等,和在香港的王匡、杨奇、罗孚、曾敏之等。《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中整整一辑“近现代香港作家论衡”,就建立在这样的资料发掘和实证访谈基础上,这也成为许翼心学术研究的特色之一。

惜墨如金,许翼心毕生著述不算太多,他自述“三十余年来见诸海内外报刊的长短文章,粗略统计也有五六十万字之多”。这部30万字的《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只是其全部著述的一半,最遗憾的是他做了许多准备的《香港文学简史》未能最后完成。但学术研究的价值,不在量的多少,而在质的高低。他这30万字的“历史观察”,在某种意义上胜过了一些人十部八部的皇皇大著。

今年是祖国大陆开展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第40个年头,许翼心是伴随这一学科发展的潮头人物之一。许多与许翼心先生一样同心戮力开掘这一新学科的先行者,如始终引领这一学科前行的曾敏之先生,如学者封祖盛、王晋民、武治纯、潘亚暾、庄明萱、黄重添、汪景寿、陈辽、林承煌等等,均把自己生命的最后光辉,奉献给这一学科的开拓和建设。如今,新一代中年和青年的学者,已扛起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大旗,成为这一学科建设的中坚。前辈学人的最初开拓,历经的坎坷、作出的业绩和留下的经验,值得我们敬重和继承。作为一个新的学科,40年岁月不算太长,但也不会太短。追述前人足迹,总结历史经验,进入学术史的研究,已是提上日程的时候了。



彦火(左)与金庸

金庸写给彦火(潘耀明)的信

有这么一种说法,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始终贯穿两条线,一条是明线,叫书生气;另一条是暗线,叫江湖气。书生,讲究节;江湖,讲究义。我倒觉得也可以说,书生,江湖,既讲情,也讲义。香港作家联合会长潘耀明笔名彦火,犹如一“文侠”,亦情亦义,“书生气”和“江湖气”兼而有之。“彦火”者,火焰也,发光,散热,在香江文坛乃至世华艺苑,成就一番事业,缔造出难以复制的传奇。

1978年4月,我自平潭岛来到福州城,先后供职于《福建文艺》(《福建文学》)和《台港文学选刊》,四十有一年矣。结识彦火兄,前后聚首数十次,真个投缘,且拈出二三事。

彦火兄好酒,尤好洋酒。记得1994年初夏,《台港文学选刊》组团访港。彦火引我们探访兰桂坊,一连带进三四家酒坊。那晚,我在他连哄带劝下,接二连三,鸡尾酒干了好几杯。没曾想,此乃混酒也,好入口,却难消受。夜里,醉倒了,恰似落入“温柔陷阱”,着实领教彦火兄之“情”“义”的威力!

彦火行事风格,可以“大气”二字概括。他在香港三联书店任职多年,策划了15套文丛,自古至今,从内到外,洋洋洒洒,组成“世界华文文学大观”。同时,又不囿于此,拓开去,选题极为宏阔,如《五千年中华文化大视野》《五千年世界历史故事》《中国五千年性文物大观》等等,让人眼界大开。一体两面:“大气”的背面,可谓“务实”。此君从不枉虚名,一旦任职,便意味着担责。于是乎,人们看到了这些年他所主持的各类活动,办得有声有色。

刘登翰近时在悼念陶然的文章里提到了一件往事。1995年,在他生命的一段“灰暗的日子”里,选择来到香港,香港的朋友们伴他度过那段“阴郁的日子”。他住在岭南学院从事客座研究,“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朋友来邀我下山吃饭,或到什么地方看个展览,喝杯咖啡”。文中提到了彦火,提到了梅子、大洲(秦岭雪)、立川、纯钩、密密、舒非、诗剑、巴桐等等,还有曾敏之先生、犁青先生和安排他到岭南“客座”的梁锡华先生。刘登翰无比感慨地说,正是这份陪伴,这份友情,帮他走出了人生的晦暗,重新振作起来,他永远不能忘怀那段日子深深感受到的恩惠。我想,不少文友或许都能感同身受,在香港,总能体味到这种让人无比温馨的恩惠。

彦火与金庸的“忘年交”,堪称香港文坛一段佳话。彦火多次撰文,提及金庸如何邀约,交谈片刻后即亲笔写聘书,聘其为《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他始终念念不忘这一“知遇之恩”。这是文友们熟知的。但他后来也有过不尽顺畅的经历,金庸事后当面表达了歉意,对此,彦火在文章里只是轻带过。记住该记住的,忘掉该忘掉的。无怪乎,金庸如此看重这位子侄辈挚友。

且看金庸写给彦火的信:

许多天、许多年之前,情感曾在心中流过,
今天、明天、明年、后年,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却永远流不尽,
因为有些情感——
是永恒的,那是深情。

为耀明兄《永恒流动的情感》书

金庸 一九九九年八月

金庸2018年10月30日仙逝,彦火迅即撰文,深情缅念这位良师益友。他写道:“金庸不光是我工作的上司、老板、忘年交,也是我为之获益良多的老师!”有些媒体冠其以“金庸的秘书”、“金庸的亲信”、“金庸的代言人”的名衔,彦火明确表示“不敢掠美”,他顶多可说是“金庸的小字辈朋友”。

彦火与许多文坛前辈过从甚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即开始进行中国作家研究。几年前,《收获》和《台港文学选刊》连续多期发表彦火介绍现当代文坛大家的文章,还选登了一批名家信札。透过他的翔实、细致的描述,茅盾、巴金、叶圣陶、俞平伯、冰心、萧乾等一代大家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宛现眼前。然而,也有一些信札因故遗失,出现在一家拍卖行。彦火从其预展资料获悉,怒不可遏,当即于2014年12月20日在《泉州晚报》发表“严正声明”:“这些信件纯属我与作家朋友之间往来的私函。本人对此深感慨慨。除了要求拍卖行立即停止这次不法的拍卖行径,本人将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权利。”

1982年6月,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在暨南大学举行,彦火和高旅、海辛、陶然、梅子等香港作家与会。彦火兄于会上作了《浅谈香港文学》的发言。他有两段表述:

香港地处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它同时承受了东西文化的熏陶,本来应该产生出令人瞩目的文艺作品和拓展广阔的文艺天地……由于功利主义的泛滥,文化不能够得到健康的、蓬勃的成长,反之,它是被压在石缝下,迂回、曲折、艰苦而勇敢地生长。

从上面介绍的情况所显示,香港文艺界荆棘满途。这是客观存在的困难。但在这些的背后,也有一种朴实、诚恳、进取、刚毅的生活态度。香港的文艺界因为历经风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生命力特别顽强。香港老一辈小说家刘以鬯曾以“劲草”形容艰苦不息的香港文学活动,这是十分贴切的。

上述两段话虽不长,却将香港的特点、香港文坛的特点和香港文学工作者的特点,描述得十分确切、清晰。“迂回”、“曲折”、“艰苦”、“勇敢”、“朴实”、“诚恳”、“进取”、“刚毅”,看着这些字眼儿,不由让人联想起彦火的人生历程和创作生涯。早年,他目不识丁的父亲漂洋过海到菲律宾谋生,在穷乡僻壤落地生根。同样是文盲的母亲,克勤克俭,到工厂“剪线头”供彦火上学。彦火利用周末穿塑胶花、鞋拉链头赚零用,帮补学费。“爱拼才会赢”,彦火艰苦而刚毅地“破土而出”,经过数十年打拼,终于成就了今天令人钦敬的一番事业。回顾彦火传奇般的人生经历,简而言之,如要概括地刻画他,我另有一比:亦情亦义一“文侠”!

彦火:
亦情亦义——文侠

□杨际凤



华文文学
HUA XIN
唐建威书

记忆与故土
兼论余光中的乡愁情节
□季浩

我的现代诗启蒙,很可能与诸多的文友不太一样,我首先接受的现代诗不是徐志摩、卞之琳、李金发,而是余光中、洛夫、商禽、纪弦、痖弦等台湾诗人,而给我启示最大、最先给予我强烈触动的,又是他们所写下的所谓“乡愁”诗。在我阅读他们的那些“乡愁”诗歌的时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刚刚初中毕业,那时我的最大心思是“离开”家乡,越远越好,心里和身体里充满着对故乡和旧有的叛逆。然而极为奇异或者吊诡的是,我迷恋着来自余光中、洛夫等诗人的“乡愁”诗,并在海兴县师范宿舍的那张小床上,写下了大量的“仿作”,似乎自己是一个早已远离故乡,并且匮乏回乡机遇的“游子”。就在自己的那张床上,我给了自己强烈的、多少有些造作的“游子心态”,就在自己家那张堆满了旧有的书籍、报纸、脏衣服和臭袜子的床上,我开始思念这张床。我虚构一张船票,同样把我带向了远方。

现在,我依然感激那个年代,甚至感激自己写下的那些粗陋的、为赋新词而强说出来的诗。我认为,至少是部分地认为,这一模仿尽管拙劣,但也包含着对自我的诗歌启蒙。必须承认我当时并不能真切地领悟余光中诗歌中的情感包含,但它渗透出的点点滴滴,却足以让我产生共感和共鸣。

“乡愁”在我看来具有“双重”的性质,一重是记忆的,而另外一重则是乡土的,被称为“故乡”的那个地方。许多时候它们是融合的、互溶的,乡土承担着记忆,也承担着那片土地上的山川、河流、池塘和雨水的丰茂,像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即是如此。在这里,乡愁是邮票、是船票、是坟墓、是海峡,是“故乡”和故乡之情的双重隔开,所有的思念和怀念、怀与想都因此产生,并且日趋浓烈。在这首被反复称颂、广泛赞誉的余光中先生的《乡愁》中,它异乎寻常地简洁,有一种三秋之树的骨感和嶙峋,然而恰恰因为这份不渲染的单色唤起我们的情感填充,想象填充,从而获得了惊人的丰满。在余光中先生、洛夫先生乃至右任先生的“乡愁”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或者说真切地感受到他们背井离乡所带来的思和念的遥不可及,在余光中和那些台湾诗人的乡愁诗中,“乡愁”意味着与故土的远离和割裂,与一份旧有情感、旧有风土和血脉的远离和割裂。在这里,“乡愁”更多地针对于“故乡”,那